

近代留日小说中的东京镜像^{*}

——以向恺然《留东外史》为代表

施 晔

摘 要：向恺然的《留东外史》是近代中国留日小说中的翘楚。然而，学界对《留东外史》很有限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小说的道德诉求及黑幕揭露方面，并且，向氏的其他几部留日小说如《留东新史》、《留东外史补》及《留东艳史》等一直处于无人知晓或问津的状态。作为近代留日小说的代表，向氏留东系列描述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留日热潮，反映了异质文化带给国人的巨大冲击，对留学生、流亡客、政府官员等各式在日华人的描绘刻画更是鲜活生动至极，其视野之广阔，笔力之雄健，揭露之犀利，前所未有的。

关键词：留日小说；向恺然；留东系列；东京；镜像

中图分类号： I2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5833 (2010) 03-0178-09

作者简介：施 晔，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上海 200234）

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学生 13人东渡扶桑，拉开了晚清国人留学日本热潮的序幕。稍后，反映留日学生生活的小说也相继问世。第一部专门描写留日学生及游历官员生活的小说应是履冰的《东京梦》，其后向恺然的《留东外史》继承并发扬了《东京梦》谴责小说的传统及故事情节，成为反映民国初年在日华人众生相的集大成者。

向恺然（1890 - 1957）祖籍湖南平江，早年曾两次负笈东游。1914年始，向恺然以“不肖生”的笔名开始其留东系列小说的创作。《留东外史》署不肖生著，跛子批点，全书十集一百六十章，由民权出版部陆续刊行于民国五年至十一年间，第一集首有陈序（陈荣广）、刘序（刘韵琴）及张序（张冥飞）。《留东外史》以辛辣的文笔，讽刺揭露了部分中国留日学生、政治流亡者或游历官员的种种丑行劣迹，“宁牺牲个人道德，续著《留东外史》，以与恶德党宣战”。小说付梓印行后，风行一时，销路甚广，成为近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现代小说。向氏遂延续《留东外史》的谴责小说风格，又作《留东新史》及《留东外史补》。《留东新史》凡三十六章，署不肖生，首有民国十三年六月荃狂序，民国十八年三月世界书局已印行第三版。《留东外史补》共十三章，目前仅见后七章，署不肖生著、天笑评眉，民国十五年三月大东书局出版。此二书仍以揭露挞伐在日华人的恶德劣行为主。因向恺然《留东外史》叙写留学生及亡命客种种

收稿日期：2009-11-19

^{*} 本文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专项项目（项目批准号：S30403）和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项目批准号：09YS185）的资助。

《留东外史》只有二集十八章署成舍我评、不肖生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王无为批眉，其余皆为跛子批点。

不肖生：《留东外史》第一章，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页。

行为有声有色，且人物性格突出，遂为“五四前最有号召力一个小说作家一种作品”。《留东艳史》凡三十章，标“香艳小说”，首有大错叙，民国十八年四月亚洲书局出版。是书为向氏留东系列小说的最后一种，亦为其中的另类，纯属才子佳人小说，且为明代中篇传奇《刘生觅莲记》的翻写本。除《留东外史》外，学界鲜有人注意向氏的其他诸种留东系列小说，《留东新史》世界书局版、《留东外史补》及《留东艳史》均未见著录于樽本照雄之《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向恺然《留东外史》等小说虽以揭露在日华人众生相为主旨，但因故事场景多在日本，尤其是首都东京，故小说无可避免地打上了东洋城市文化的鲜明烙印。小说中的芸芸众生——留学生、政治流亡者、游历官员、驻外使节及商人——怀揣不同的使命东渡扶桑，作者从他们初次遭逢东京先进城市文明时的惊诧与艳羡中，从他们努力融入异国主流社会却始终处于边缘及被蔑视地位的尴尬与愤怒中，读出了20世纪初在日华人从自身固有的中国本土经验出发而获取的对东洋社会及异质文化的新异体验，并将此用文字固化成奇幻多元的东京镜像，折射出国人眼中纯美多姿的城乡风景及悖论迭出的日本国民性。作者对东洋女性的欲望视角兼融唯美与情色、渴望与蔑视，并潜伏着隐秘的国家意识，呈现出充满征服欲的感官狂欢色彩。

一、东京印象：繁华表层下的先进城市肌体

东京原名江户，自1603年德川家康于此开设幕府始便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随着城市规模及人口的与日俱增，江户逐渐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1869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把江户改名为东京。从此，东京迅速崛起为举世闻名的日本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明治（1868 - 1912）、大正（1912 - 1926）时期的东京一方面汲取西方工业文明及城市建设的精华，另一方面保存城市原有的淳朴风貌及人文景观，迅速成长为一个高度发达且风景优美的繁华都市。这两个特质原汁原味地保留在《留东外史》一书中，成为富有质感及层次的东京书写。

从大部分来自中国内陆欠发达地区的留学生的视角出发，东京的华丽光鲜必定是震撼每个人的最初印象。银座商业区位于新桥与京桥之间，“车马之繁盛，铺户之雋丽，为东京全市冠。驰道两旁，皆种杨柳，较各区气象迥殊”。三崎町夜市“两边的路摊，接连摆着，形形色色的小买卖，无般不有。街上往来的人，从高处望去，只见人头如波浪一般，簇簇的涌动。少男幼女，也不知有多少”。休闲娱乐场所浅草“是东京名所，秦楼楚馆，画栋连云，赵女越姬，清歌激晓。虽说没有什么天然的景致，人力上游观之适，也就到了极点”。专做昂贵的中华料理的万花楼是东京的高档餐馆，“规模十分宏大，三层楼，有数十间房子，陈设都焕丽。更有一层为别家酒馆所不及的，就是每间房派定了一个下女伺候，免得要使唤时拍手按铃种种手续”。更有盛大的东京博览会，不仅陈列着各县的土产及及各工匠人所制的巧妙器物，“千珍万宝，琳琅杂错”，还有电光术、空中电车等现代科技产品展示。此外，锦辉馆的活动写真，本乡座的杂耍，帝国剧场的舞扇歌影，三越吴服店的时尚衣饰，筑地精养轩的高档餐馆，吉原游廊的妖娆娼妓……食色人生的无比精彩仿佛都浓缩在这个空间，对初达此地的莘莘学子构成了致命的诱惑。

更让人惊叹的是与东京繁华相映成趣的自然之美。二重桥、赤坂别宫、芝滨离宫、日比谷花园、九段坂靖国神社、浅草寺、芝公园、团子坂、植物园、向岛、不忍池等名胜古迹。或亭台幽邃，或蒐集珍奇，或殿宇伟丽，或风物如画。上野的樱花、蒲田的红梅争奇斗艳，不时盛开在向氏的东京书写中。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每年初春，上野、荒川的樱花盛开季节便是东京人的盛大

沈从文：《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载《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清）郭啸麓：《江户竹枝词》，载王慎之、王子今编《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 - 324页。

《留东外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123、62 - 63、463页。

节日，赏樱人群倾巢而出：

那夹岸的樱花开得正好。游人虽多，因堤长路宽，却不拥挤。许多乡里人三五成群，背着酒坛，穿着一身花衣，画得一副脸青红紫绿，无色不备，故意装出几分醉态，在堤趑趄趑趄的偏过来倒过去。遇着年轻生得好的女人，便涎皮涎脸的跟着胡说。胆大脸皮厚的，见了女人便掬起衣做要撒尿的样势，引得那些女人笑个不了。警察见了，也背过脸去笑。还有些偏僻地方不时髦的艺妓，终日不见一个人叫他的局，在家中闷得慌，也纠合着东家姨西家妹，三个一群，五个一党，都是浓装艳抹，拖着长裾，擎着花伞，分花拂柳的，惹得一般平日无钱叫艺妓的穷生，跟在背后馋涎欲滴。

这段文字似一幅活动的赏樱浮世绘，“笔酣墨饱，写来如花团锦簇，异样光彩”。

在最初的感官饕餮沉淀之后，理性的探求抬起头来。东京不光有光鲜华丽的表象，更有让国人自叹弗如的深厚内涵。

城市公共事业先进且人性化，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市民的出行相当便捷，“东京电车轨道贯通全市。远近车价一律。其券以淡红纸为之。每遇坐客拥挤，若有女客后至，则先至者当起立让坐。盖其从来之习惯为然也”。城际交通同样发达，苏仲武暑假去日光避暑，“由上野火车站坐奥羽线火车到宇都宫，换了日光线火车，五点多钟便到了”。跨国交通则有大小不等的海船，近者通航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远者直抵西欧各国。《留东新史》中汪衡亡命日本所乘的天洋丸简直就是一座浮动的小城，“舱位与蜂房相似，千门万户”，餐厅“足可容纳一千人，不至拥挤。了字型的摆着两长条大餐桌，桌的两旁都整齐严肃的坐满了，一色的穿着西装”。此外，东京的城市管理及公共安全网络也是非常发达的。日本的警察是城市的哨兵，管辖范围非常宽泛，小到巡街拉架，禁止市民赤脚上街、留学生聚众赌搏，大到侦破凶杀案，查办枪枝买卖等，“持棒巡行，计划受代，皆有手札，录报于局长。余考其职，盖兼周官司救、司市、司黻、匡人、擗人、禁杀戮、禁暴氏、野闾氏、修闾氏数官之职，后世惟北魏时设候官，名曰白鹭，略类此官。西法之至善者也”。《留东外史》七十章中，便衣侦探村田追踪疑犯时的敬业精神让故意逗弄他的黄文汉也心生惻隐。网格化的城市管理模式在上世纪初的东京已初具雏形。

东京的文化教育事业同样让人叹为观止。博物馆、图书馆比比皆是，帝室博物馆藏品丰盈珍秘，“汉唐古镜宋丹青，考古人来见典型。别为禅林储秘本，蚕眠小字法华经”。大桥、上野等区均设的市民图书馆，另有早稻田大学“亦附设图书馆，藏书凡十一万卷。中有宁斋文库、百日红园文库”，任人纵览。新闻业尤其发达，时效性之高令人咋舌，“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留东外史》第六十九章吴大澂深夜行刺袁世凯爪牙蒋四立，第二天清晨，新闻纸上已登出“蒋四立被刺”头条号外，当事人吴大澂惊诧万分，“这新闻纸上的记载，几乎比我自己还要明白。昨晚十一点钟出的事，今早新闻上就都有了。日人消息灵活，真不能不教人佩服^⑪。袁世凯当局的驻日大使海子與暗地里勾结日本当权者，企图向日本购买十架劣质飞机，又怕民党及革命派流亡者得了风声横生枝节，所以藏头露尾，暗箱操作。“谁知那不做美的日本新闻纸，只解得有闻必录，全不知替人隐瞒，竟将事情始末尽情披露出来。^⑫日本记者的眼明手快因此闻名于世。日本的教育事业也足以与西方强国抗衡，初、中、高等各类学校功能定位明确，高等教育有专门培养精英人才的一流学校如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无人不学材非弃，一

⑪⑫ 《留东外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287、378、738、1149页。

（清）郭啸麓：《江户竹枝词》，载王慎之、王子今编《清代海外竹枝词》，第330、322、322页。

《留东新史》，世界书局民国十八年版，第5章第7页。

《留东新史》，世界书局民国十八年版，第6章第7页。

（清）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载王慎之、王子今编《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1、112页。

技之长业必精。学校如林务研究，羞从纸上习谈兵”。日本的专门教育也很发达，如“高等商业、高等工业、外国语言各学校，海军、陆军、士官、砲工、美术、音乐、商船、盲哑、农林各学校，札幌农学校，仙台、金泽、冈山各医学校……凡普通专门各学校，书不胜数”。《留东外史》中提到福岛县山川健次郎开设的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带领学生在雪里练习体操，以培养他们坚强的毅力及强健的体魄。学校的硬件也相当完备，讲堂、试验室、标本室、仪器室一应俱全。由下田歌子等有识之士倡导的女子教育也独树一帜，特色鲜明，下田歌子女士本人就创办了实践女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日本女性教育普及率很高，连《留东外史》中出身贫寒的妓女樱井松子都是渡边女学校的学生。明治年间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曾作诗咏日本女校学生，“捧书长跪藉红氍，吟罢拈鍼弄绣襦。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勾也地舆图”，活画了少女的天真烂漫和她们丰富的校园生活。

当然，向恺然有时也会揭开城市的华袍去窥探其遮掩着的寒酸。大正年间，东京平民的生活水平还相当的低，纨绔张孝友坐着马车去探望画家松本时，发现松本极为贫寒，“住了几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在一个小小的巷子里面，莫说马车不得进去，便是两个人想并排着走，也是摩肩擦背的”。当时市民坐东洋车的都很稀少，更别提马车、汽车了。“所以住在巷里的小儿，忽然见了这东西，很觉得奇怪，都聚在松下的门口来凑热闹。”前文所提及的妓女樱井松子被周撰抛弃之后，只好靠当私娼维持生活，租了一间四叠半席的小屋，“房中的蒲团几子，却都陈旧得表示一种寒村气象。一个白木粗制火炉，塞在几案旁边。炉中的灰，因烧炼既久，未经筛汰，便和零星灰屑，结成小块。许多纸烟屑、火柴棒，都横七竖八的，在那些小块上乘凉。壁间悬挂几件旧布衣服，大约是松子在家常穿的”。贫民窟和城市贫民之间是每个时代每个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这一部分的城市是残缺和虚假的，如此，向氏笔下的东京印象就真实、立体、丰盈起来。

二、倭女娇娃：唯美与情色的载体

在中国男性的眼中，日本女人的美丽与柔顺无可匹敌。白皙细腻的肌肤，温柔大方的笑靥，苗条匀称的体态，温雅恭顺的妇道，东洋女与樱花一样，成为都市唯美景观的一部分。“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柳弱，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郁达夫从贞操观念、体型、外貌等诸方面对日本女子作出的评价颇具代表性，这些肥白柔美可爱的东洋女使郁达夫体味到了性的诱惑及冲动，也无时无刻不牵惹着留日学生们的心魂。比起中国女人，日本女人确实更大方更开放，“日本妇女在关于性问题上也有某种自由，出身越是低微，自由越大。她们一生在大部分期间必须遵从许多禁忌，但绝不忌讳男女间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地，在满足男人的性欲要求之时，她们又是克制性欲的。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抛开禁忌，如果出身低微，她的淫荡毫不逊于男人”。确实，日本民族是个崇尚自然的民族，强调感官享受，女子

（清）濯足扶桑客：《增注东洋诗史》，载王慎之、王子今编《清代海外竹枝词》，第270页。

（清）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载王慎之、王子今编《清代海外竹枝词》，第116页。

《留东外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396、1560页。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雪夜》，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7页。

的贞操观念淡薄。因此，向恺然有意无意地将日本女子妓女化，在留东系列小说中，无论侯爵千金、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看护妇抑或各类女仆，都很轻率地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日本女子好色，较男子尤甚”，“他们日本女人把和男人睡觉这桩事，本看得不算什么”。这样的女人有时甚至吓倒了中国人，《留东外史》中，湖南留学生杨玉与同学去蒲田赏梅，邂逅一十五六岁的卖门票女子西山玖子，杨玉逢场作戏地和她开了些小玩笑，这个忠厚淳朴的乡下女孩便很当真，赶到东京夜奔杨玉，“也不问杨长子肯不肯，匆匆脱得精光，钻入杨长子被里”。反把杨长子惊吓得不轻。即便已婚妇女，遇到心仪的男人，也会主动投怀送抱，如《留东外史补》中的有夫之妇藤田秀枝，背着丈夫与江西留学生潘良仲在公园中幽会，还主动约请潘去旭屋旅馆奸宿。正因此，对日本女性的欲望视角与妓化处理构成了向恺然日本书写的一个重要部分，弥漫着无边无际的情欲气息及征服快感。中国男人在东瀛温柔乡里终于挣脱了长期的性禁锢，肉体中蛰伏的欲望被挑逗激发，喷涌而出，于是追逐、玩弄、欺骗、抛弃东洋女人成为他们留东生活的重要内容。

《留东外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东洋女人无疑是各类妓女，向恺然将她们大致分成四类。艺妓身价最高，京桥区名妓万龙决非留学生辈能高攀的，“日本人有两句口白：‘吃酒要吃正宗（日本名酒），嫖妓须嫖万龙。’这万龙色艺高到绝处，身价也高到绝处。非王孙公子，休想问津”。几个中国纨绔花了许多冤枉钱也未能如愿。艺妓皆在待合室接客，嫖客事先可到待合室指名调来，待合室的经营者多为老妓。黄文汉在小城大矶花了十五块钱请四个艺妓陪他欢歌艳舞痛饮，另有名妓千代子陪宿，艺妓侍寝时递果、更衣、挂帐等一系列动作更像个唯美的仪式，香艳而不淫靡，体现了作者雅致的审美情趣及对东洋女性独到的鉴赏眼光。

其次是以女学生、良家女身份勾引嫖客的高等淫卖，如渡边女校的樱井松子“借着女学生名目，充高等淫卖”，留心专做中国人的生意，勾到纨绔周撰后，只要了六十元便与周同居。李锦鸡在锦辉活动写真馆勾搭的佐藤春子出自贫寒之家，靠卖淫满足虚荣心，李锦鸡以每月十五元的价格包下春子，每月三十日，夜夜来上野馆侍寝。另有柳花加入日本秘密妓女组织，“尽各个人本身的能力，与国家谋幸福”。开展跨国卖淫及移民活动，类似我们熟悉的电影《望乡》中的阿琦婆，柳花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地。

再次是公娼、酌妇。公娼也称女郎或游女，聚集在游廊营业，“东京有不夜城二，曰吉原，曰洲崎，并为一廓，故曰游廓。三千佳丽缓立低坐，不啻为插竹布盐以待羊车之幸也”。华灯初上时，东京吉原游廊“所有女郎，一个个都穿着花衣，成排的坐在阑干里面，任人挑选”。游廊里面，“和蜂窝一般。千门万户，每间房门口，摆着两双拖鞋，有没接着客的，尚在外面阑干里坐着，房门口便没拖鞋”。官许娼妓须向政府纳税，每夜限侍三客，“衣分次序，红为始，绿次之，紫又次之。示人以信也。年轻而初款客，以纸特书，曰‘初见世’^⑪。另有一种称酌的妇人，“酌妇并不是下女。横滨、浅草的普通洋酒店及料理店，都有酌妇，能弹唱、侑酒。有相当机会时，与以相当代价，亦能留宿，但未经警察许可，不能正式营业。此种地方多兼营旅馆及下宿业，以便掩饰”^⑫。郑绍畋、黎是韦在赤阪笠原店嫖酌妇，住宿费每夜不过三四元。

最末一等是暗娼，如郑绍畋所嫖的秀子姐妹，罗福所嫖的芳子等，她们是性病传播的主要渠道，故为政府所禁止。何达武包占沦落为暗娼的樱井松子时，松子的房东说“秘密卖淫是警察署不许可的，警察若知道了，就要来拿的。拿着了，我做房主的受连累”^⑬。所以松子每接一客，她都要收一元“手数料”。

无论是艺妓游女，还是良家女子，均是留学生们集体窥视的目标，她们充当了中国男人欲望

⑪⑫ 《留东外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819、849、65、38、858、1538、1543、1709、1571页。

（清）郭啸麓：《江户竹枝词》，载王慎之、王子今编《清代海外竹枝词》，第 331页。

⑬ （清）陈道华：《日京竹枝词》，载王慎之、王子今编《清代海外竹枝词》，第 351页。

的载体，消费的对象及遣兴的猎物。在性欲得以释放的欣欣然中，留学生以一种征服者的心态俯瞰着这些秀色可餐的东洋女，并毫不留情地给她们贴上低贱、淫卖的标签。“到这浅草来的女人，不要问他卖不卖，只看你要不要。莫说是下女，便是他日本华族贵族的小姐，只要他肯到这里来，你和他讲价就是，决不要问他肯不肯。”与此同时，作者将女体上升为国体，“这浅草，是日本淫卖国精神团聚之处，淫卖国三个字的美名，就以这里为发祥之地。你试留神看街上往来的女子，那个不是骚气凛凛，淫气腾腾”？盛产“淫卖女”的日本也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淫卖国”。这种观点未免武断偏激，然而蕴涵着深层次的国家意识及民族仇恨。面对这个前恭而后倨甚至企图吞并中国的蕞尔岛国，面对日本政治家笑里藏刀的笼络政策，面对大和国民“豚尾奴”、“支那人”的蔑称，中国留学生的屈辱与愤懑难以释怀。于是，作者一厢情愿地将征服日本女体等同于征服日本国体，以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平衡心中的自卑、屈辱与愤怒。

此外，中国的性文化，尤其是性心理和性道德观与日本存在很大差异。日本人至今依然保持着远古时代对“性”这种生命本能所怀有的质朴、坦荡和从容的感觉，并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感觉艺术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艺妓”就是“艺术化的妓女”，相较于世界各地靠卖春而生活的女子而言，只有日本艺妓敢于神态自若地迈着优雅的步伐，出没于大街小巷和各类富丽堂皇的场所。而中国儒家文化却将性和女体功利化，认为性和女体最重要的功能便是传宗接代，追求快乐的性及女人统统被视为淫，所以，日本人对女体美的崇拜及对性爱的宽容便理所当然地被归入淫卖之列。留学生胡庄驳斥奚落中国留学生不自爱的日本警察说：“贵国不是从有留学生才有淫卖妇的，是留学生见贵国有淫卖妇可嫖，才嫖的。这样看来，贵国的淫卖妇，也就未免太多，贵国人也就不免太不自爱。”由于两个民族性道德及性文化的差异，在感性上，中国男性喜欢温柔顺从、自然大方、“性”趣盎然的东洋女子，只恨不能尽揽怀中供己享乐；但在理性上，他们又蔑视、轻侮她们，口口声声称其为淫卖妇，将几个具有中国节妇影子的女子如中壁圆子、山口节子、柳藤子用正笔竭力描摹，赞美她们对爱情的忠贞与执着，这种感性与理性相悖离的中国文人情色书写传统被向恺然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

三、菊与刀：悖论叠出的日本国民性

首次将日本文化的类型归纳为菊、刀意象的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菊”本为日本皇室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则别出心裁地以菊与刀象征日本国民性中的矛盾与悖论及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无疑具备犀利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涵盖力。而大和民族国民性中的这些悖论与双重性在向氏的留东系列小说中也得到了极为生动及形象的表现。

日本民族是个重视形式及细节的民族，“日本自江户时代以来，诸般万事，皆坚持‘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于是乎就有‘禅道’、‘茶道’、‘花道’、‘香道’、‘极道’（黑道）、‘众道’等门道”。因为一个细节的失误，武士便会引咎切腹，而切腹的部位及场所也极有讲究。毛丹青因此说：“日本人工于精、细、专，崇尚秩序和集体，追求准确、一丝不苟和琐细，连商品都以‘精巧于小’；而非‘万全于大’著名于世，这样的习惯和心理，犹如蚂蚁、蜜蜂那种社会性的小昆虫。”

确实，逼仄的生存环境与贫乏的自然资源一方面养成了日人的精致琐细、注重形式和一丝不苟，而在精巧于小的同时却也造就了猥琐的岛国根性，如精明小气、金钱崇拜、善于算计等，很难养成大气量，开启大手笔。《留东外史》中的医生浅田当属日本的中产阶层，却为纨绔张孝友华丽的穿着、阔绰的举止、大方的出手所迷惑折服，吃过几次饭，受过一些礼后，浅田一家便认

《留东外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1年，第 123、123、95 - 96页。

参见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

[日] 茂吕美耶：《江戸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15页。

毛丹青：《发现日本虫》前言，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页。

定张是中国大员的少爷，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个财神，“日本人本来小气，既存了个钦敬之心，五脏七孔及周身骨节，都不由的呈出一种媚态来”。浅田迫不及待地将16岁的女儿波子嫁给了张，岂料蜜月还没度，囊空如洗的张孝友便抛下波子溜回了中国，爱贪小便宜的浅田赔了女儿又折兵。更令人不齿的是中川质屋（当铺）的老板生财有“盗”，竟然偷创客人典当的黄金饰品，以积少成多获取蝇头微利。对于日本人这些贪小习性，向氏的针砭不遗余力，如“日本人爱受人家的好处，你越是不和他计较，他越以为得了便宜，从不肯十分相让。这种脾气，或者是他日本立国的根本，也未可知”。讽刺的尖刻莫过于此了。

日本民族是个好学的民族，尤其善于模仿。明治维新之前主要以中国为师，维新以后则唯欧美国马头是瞻，在吸取文明精华的同时又善于甄别，兼备去粗存精、自我保存及发展的能力，“日本在接受佛教、道教、儒教、兰学、基督教、现代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各种不同的外来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时，都怀着贪婪的好奇心，但并没有因此抛弃传统的东西，而是把新吸引的东西溶合进来，让它重叠在过去的传统之中”。正因为这份好奇心，日本实现了社会经济和国家实力的腾飞。

然而，日本又是个极为势利的民族，崇拜强者、显者；蔑视弱者、微者是大至国家、小至个人的处世哲学。近代以降，在比自己更加强大的西方列强面前，日本民族做小服低，五体投地；而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则蔑视欺侮有加。这一传统至今都没得到改观，只是中国的日益强大让这位近邻的不安与日俱增。向恺然留东系列对日本民族这一劣根性的揭露极其生动。《留东外史》中，英国人汤姆逊是个在日协助建造中央停车场的工程师，他家的西崽鲍阿根犯了事被扭送到警察署，警察因他是西洋人的奴仆，打狗还看主人面，竟不肯认真追究，因为“日本小鬼最怕西洋人，鲍阿根又在汤姆逊那里当差，更是不敢得罪他的”。而《留东外史补》中，与军官藤田秋水之妻秀枝有奸情的中国留学生潘良仲却被非法拘捕，警察用绳子牵狗一样拴着他在大街上示众，还强迫他坐了一周的监牢。哈西势利不仅是政府行为，在普通市民中更为常见。《留东外史》中有一个关于中国菜的细节很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特性，“日本人吃中国菜，没有吃不来的。凡说吃不来的，都是装假，都是些没有知识的人；以为我是个日本人，是世界上一等国的国民，中国这样弱国的菜，我若说吃得来，须失了我的身分。若是西菜，那怕极不能入口，他情愿吃了不受用，再背着人去吐出来，抵死也不肯说吃不来西菜”，真是可笑至极。又有菊家商店的高山雄伟在中国驻日使馆参赞朱湘藩的强大金钱攻势下心甘情愿地将漂亮女儿双手奉上，异常得意觅得这位有权有势有钱的中国贵婿。不料婚礼前夕，高山女儿鹤子邂逅堀内侯爵之子秀吉，为攀侯爵高枝，高山父女硬是赖掉了朱湘藩的婚约，而本不赞成儿子同平民结婚的堀内侯爵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大光其火，高山父女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劣根性在这个小市民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日本民族是个尚武好斗、敢于舍生取义的民族。这一点必须追溯到日本封建社会的传统武士道精神。武士道即武士的职业道德，其核心便是绝对忠于主君，舍弃名利，义勇奉公，置忠义于生命之上。武士阶层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他们不但精通武艺，在道德上也是其余三民的楷模。《忠臣藏》的光辉史事至今遗响不绝，其中赤穗四十七浪士为主人浅野长矩复仇后集体切腹的义举即便在当下仍被日本人奉为“男子汉终极美学的罗曼史”。虽然明治维新废除了封建等级制，武士也逐渐在日本消失，但武士道思想对日本社会仍产生着深刻影响，如政府官员、军队将领必须绝对效忠天皇，以清廉自守、克己奉公为人生信条。还有很多近代教育家（如嘉纳治五郎）仍在不遗余力地倡导尚武精神和柔道，其目的便为“原不求单独胜人，但求他普及，

《留东外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93、438、1023、463-464页。

[日]鹤见和子：《好奇心与日本人》，詹天兴等译，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日]茂吕美耶：《江戸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国民都有尚武的精神”。嘉纳因此还创办了讲道馆，“专习柔术。每年暑假，学者恒至千余人”。

明治、大正年间的东京城内，还能常见相扑者的身影，《留东外史》中留学生黄文汉路过早稻田大学后的一片荒地，看到一群人围观，边看还边拍手大笑，挤进人堆一看，“只见土堆中间，两个水牛也似的汉子，都脱得赤条条的，正在那里你扭住我的腰带，我揪住你的胳膊，死命相扑”。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曾给日本带来了自立、强兵和富国，有人甚至认为日本近代化成功最重要的经验是武士道精神。但是，当尚武与野心走到一起，武士道被军国主义利用并进而发展为对邻国的侵略扩张和穷兵黩武时，其性质就完全扭曲变异了，对内它被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的国民思想；对外则奉行失之欧洲、收之亚洲的弱肉强食理念，以西方列强征服与掠夺的发展模式为范本，踏上了侵略扩张之路，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以蛇吞象，走上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留东系列小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也时有揭露和描述。《留东外史》第十四章，黄文汉游历箱根时邂逅陆军少尉中村清八，中村一看黄是中国人，便傲慢无礼起来，并恬不知耻地扬言：“若论实力，不是说夸口的话，像现在贵国这样子，除已在贵国的兵不计外，只再有十万兵，就是不才带领，贵国四百余州，也不出一年，必能奠定。”由此可见，对中国的觊觎及吞并欲望早已深入人心。

从上述对日本国民性的剖析中，我们看到了无数的悖论。正如本尼迪克特所云：“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日本国民性中的这些悖论是显而易见的，美、俄等国学者在审视日本文化时对此都有评论阐述。对促成这些悖论的深厚历史文化渊源，也从不同角度作了解析，在此不再赘述。而这种悖论在中国留日文人的视野中被有意放大乃至扭曲，他们在亲身体验日本文化的同时不断地反观对照本土文化，在对家国贫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中苛刻地寻找日本国民性中的弱点，最终形成裹挟着国家民族恩怨的日本国民性书写，况味之复杂，难以言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记载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也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隋唐两朝，泱泱大国辉煌的政治和文化成就吸引了多个日本皇室的遣唐使团前来朝拜学习。“日本典章文物，大半仿唐。当时瞻仰中华，如在天上。遣唐之使，相望于道”，其政治、文化、社会、教育体制的形成均打上了深深的中国印。稍后的日本室町文化更是“显示出了明显的中国宋、元、明文化的影响以及浓厚的禅宗式的象征性、暗示性文化特点”。然而，“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⑩。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自1592年丰臣秀吉发兵朝鲜，企图以其为跳板最终征服明朝始，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始终不变且不断膨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坚定地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成功地完成了由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型。向恺然留学日本的时代，正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亚洲第一强国的时代。但是崛起后的日本却选择了西方曾强加于自己的殖

《留东外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27、327、471、118-119页。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页。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8页。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21页。

（清）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载王慎之、王子今编《清代海外竹枝词》，第98页。

王军彦：《日本室町时代的文化及其特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

⑩ 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版。

民扩张模式，“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全胜。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也正是从甲午战争始，中国与日本开始重新认识对方。创深痛巨的中国开始刮目相看这个曾经的政治藩属及文化附庸，并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派出学生师从于从前的臣服小国；而日本开始漠视乃至不屑以前奉为神明的中国文化，蔑视、侮辱大批前往留学的中国学生，嘲骂他们为清国奴、豚尾奴。留日学生读西洋书，受东洋气，日本人轻蔑的眼神彻底击碎了他们老大帝国的优越感，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华夷固有定位，“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羡慕与自惭、失落与屈辱使留学生在审视与书写日本国民性时不免附带了较多的偏见，他们无视或者忽视诸如勤奋、坚忍、节俭、好学等优点，突出乃至放大其中的缺点，客观性随之打折。于是日本与日本人在近代留学生文学中产生了天堂与妖魔的人为裂变，日本城市先进发达，日本乡村淳美如画，日本女子温婉可爱，而创造这一天堂的日本人（主要是男人）在近代留日小说中的形象却是猥琐、丑陋、贪婪、残暴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存在于人与城市、人与自然风物之间，还存在于日本男人与女人之间。日本为男权社会，女人本无社会地位，在中国人的眼中，她们更接近于物——玩物，她们被彻底妓化。即便如此，被妓化了的东洋女也强于日本男人。向恺然以正笔描写的日本女子不在少数，如中璧圆子、山口节子、梅子等等，不一而足。而向氏留东系列对日本男子作了鬼化处理，几乎找不到正面人物，即便凤毛麟角地出现一两个，如教育家山川次郎，那也是极其苍白的空壳。

综上所述，向恺然《留东外史》中的东京镜像是诸多影像的组合与叠加，是异域与本土、他者与自我的反观和对照。向氏用平面镜反照日本都市的繁华发达与城乡风景的淳美古朴，用桃色镜展示日本女人的性感与媚惑，用显微镜和哈哈镜凸现日本国民性中的的顽劣与鄙琐。“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些形象。”因此向氏的东京镜像中渗透着鲜明的本土经验，折射出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日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也预示着风雨飘摇的中日关系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和野心而无可挽回地走向深渊。向恺然这一系列的小说在国内文坛刮起了一股留日小说旋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追捧。究其原因，一方面满足了国门初启时人们对邻邦异国及留东生活的好奇，另一方面作者对日本人的“妓化”及“鬼化”倾向也迎合了国人当时强烈的排日反日情绪。所以，以《留东外史》为代表的向氏留东系列小说“作为一种认识日本、把握日本的文本，引导着中国人对日本与日本人的认识，直接塑造了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也深刻影响着诸如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等人的留日小说的价值取向及创作书写。

（责任编辑：李亦婷）

点评意见：论文以极为细腻的眼光，通过对《留东外史》小说人物、情节及场景的深入剖析，不仅清晰地勾勒出小说作者对于异国风物的独特文学表述，也十分精准地揭示了隐寓其中的颇为微妙的近代留日文人之心态、欲望及家国情怀。全文论述细密，富于情采，引证适度，立论允当，多有新见。论文的研究角度及阐释方法，对于近代小说研究亦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意义。

点评专家：潘建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原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载《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9页。

grassland allies in the war against Huns, his military achievements in opening the Hexi corridor, and his successful contending with Hun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ll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political practice guided by this thought.

Keywords: Jiayí; Han dynasty; Huns; Rouzhi; Guanyu

A Waved River: On the History of Qingyijiang River in the South of Anhui Province

Zhang Aihua(158)

Abstract: Qingyijiang River in the south of Anhui province has many tributaries and flows in big region and varied topograph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source and course of Qingyijiang River was not the same, and every part of the river had its own regional name. The development from various regional names to a united name Qingyijiang River, was the result of emergence of modern geography and water conservancy.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Qingyijiang River and Zhongjiang or Nanjiang River, which had disappeared while was only mentioned in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was an important issue in South Anhui's local document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study of its history can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Qingyijiang River valley watercourse and environment.

Keywords: Qingyijiang river; Zhongjiang river; Nanjiang river; Local documents of South Anhui

On Lyricism and Narrative Traditions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Dong Naibin(169)

Abstract: It has been fully discussed and widely agreed that there is a lyricism tradition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However, there is also another narrative tradition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se two traditions are interacted and complementary. Since seldom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it is urge to build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study and then reexamine the whol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e paper argues that by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study of literary history may not only enlarge the resource, but also may gain many new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iterary.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since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is just one perspective, the study of literary history should use many perspectives.

Keywords: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Lyricism; Narrative; Narrative perspective; Tradition

On Tokyo's Image in the Fi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in Japan: Taking Unofficial History of Chinese in Japan by Xiang Kairan

Shi Ye(178)

Abstract: *Unofficial history of Chinese in Japan* by Xiang Kairan, was an outstanding one of the fictions about oversea Chinese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the study is limited within its moral pursuit and its disclose of social darkness. Some other fictions by Xiang Kairan are unknown. The essay argues that his series of fictions describes the current trend of studying in Japan, reflects foreign culture's huge influence on Chinese. His description of many kinds of Chinese in Japan, such as overseas students, exiled people and officers was quite vivid. The essay discusses about the narrative of Japan in this fiction, tries to show his Tokyo's image in the fictio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okyo's impression, feminine perspective and Japanese nationality.

Keywords: Fictions on Chinese in Japan; Xiang Kairan; Series of fictions; Tokyo; Image